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  
Generation of Giants

[美] 邓恩 著  
George H. Dunne

余三乐 石蓉 译

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上海古籍出版社



利玛窦到 汤若望

Generation of  
Giants

[美] 邓恩 著  
George H. Dunne

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

余三乐 石蓉 译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49.6045  
141

063566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美)邓恩著;  
余三乐,石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

ISBN 7-5325-3305-0

I.从... II.①邓...②余...③石... III.基督教  
史-研究-中国-明代 IV.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4577 号

###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美国印第安纳州 Notre Dame 大学出版社 1962 年出版

##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

——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

[美]邓恩著

余三乐 石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21  $\frac{12}{18}$  插页 7 字数 400,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305-0

K·435 定价: 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管理部联系。T: 56628900 × 813



George H. Dunne  
(1905-1998)



南怀仁像



利玛窦像



汤若望像



范礼安神父

—选自《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二十一期



利玛窦与徐光启

—选自《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二十一期

## 译者前言

### —

纵观几千年的文明史，人类活动的半径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地理条件的局限；但同时，它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和驾驭自然能力的增长，特别是交通手段的进化而逐步扩大。因此可以说，文明半径的扩展同时就是人的力量对自然限制的超越。

中华文明最早是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它经历了小国寡民的发展阶段，经过春秋、战国时期铁与血的残酷洗礼，而在公元前 221 年达到了第一次统一。在这之后的近两千年中，中国又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多次整合，经历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仇杀与融合，当 17 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终于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文明区域。它的中心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族农业文明区，它的周围是众星捧月般向它朝贡的所谓的“蛮夷”。这几乎就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整个世界。

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代代相因，经久不衰，而不像古埃及、古巴比伦那样出现断层，从根本上说，不能解释为中国人“天生优越”，而是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保护了它。北部是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带，西部是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天然屏障，东部是浩瀚的大海。这一圈难以逾越的藩篱，虽然不能说完全阻隔与外部的交往，但毕竟使外部文明的大规模进入显得异常艰难。中华文明就这样在造物主特别的呵护下，没有经受过外部文明毁灭性的打击，而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并且从未间断地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但任何事物都有着两面，这种保护同时又是一种局限，天长日久，就渐渐地消磨了它的活力。





中华文明经历过生气勃勃、锐意进取和开放胸襟的时代。正如本书所描述的：

“中国曾经有过热衷于探险的激动人心的时代。在汉朝(前206—220)的伟大的汉武帝(前140—前87)统治下,亚洲的土地就已经回响着中国军队征服的脚步声。伟大先驱者们的探险的足迹深入到中亚地区,并与地中海文化的边缘地带建立了接触。在盛唐的黄金时代,都城长安(即现在的西安),曾是整个东方的麦加。当时,她的文化的光辉照亮了东方,她的影响波及周围各国。天主教的聂斯托里教派受到了友好的欢迎。伊斯兰教和摩尼教也被宽容和接纳。佛教继续带给中国以外部世界的新鲜思想的溪流。在元朝统治期间(1279—1368),当忽必烈的继承者们在中国南面而王时,在‘汗八里’(即后来的北京)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外国人的面孔是很平常的景观。”

但同样也像本书所评论的:“这样的光荣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产生一种令人振奋的新思想,在中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16世纪的中国,已经衰老了。这个大明王朝也已经衰老了,没有冒险和进取的精神了。”

在我看来,中国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之所以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闭关自守”。我认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赖于文明区域彼此间的竞争。根据系统论的定律,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是系统走向有序的动力;换言之,如果这种交换被窒息了,系统将走向无序,社会将失去活力。

春秋战国时期曾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活力的时期,其动力就在于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励精图治、延揽人才、富国强兵,以及“取人之长,克己之短”的不断革故鼎新,乃是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否则就可能亡国灭种。竞争可以使能者、强者脱颖而出,竞争可以为国家遴选出高明的统治者。而竞争的结果,不可避免的是强者的一统天下。天下太平无疑对生产力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一统天下的弊端恰恰是扼杀了竞争。因此当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内部的竞争虽然

可以改朝换代，却不能给中华文明的整体带来新的营养。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外部竞争对手。由于前面所提到的地理环境的因素，17世纪（也就是明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竞争对手。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就在中国人以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的成就得意地孤芳自赏的时候，在欧洲，一种以开放、进取的姿态企图占有全世界的新文明，正在迅速地崛起。它催生了近代科学，而科学又赋予它扩张的翅膀。欧洲的版图已经容纳不下它疯狂的脚步了。近代西方文明与古老中华文明两者之间的碰撞，已经成为不可避免。

## 二

两大文明第一次全面碰撞、交流和相互汲取营养，是由被本书誉为“巨人的一代”的、以利玛竇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以及他们的中国朋友们所成就的。一方是借助“文化适应”、“科学传教”策略而试图把他们的宗教传播到中国的虔诚的西方神父，一方是被新鲜的科学知识所吸引而期望以此来富国强兵的“开明开放”、“锐意改革”的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曾经真诚地合作，但他们的合作是那样的艰难。阻挡他们的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即使不是横亘于牛郎织女之间的浩淼银河，也是足以使他们头破血流的万丈深渊。站在他们中间的是来自两方面的反对势力：一方是将欧洲文明视为文明终结，将一切非天主教民族都视为魔鬼的“欧洲人主义”者和狭隘的亚利安“民族主义”者；一方是将宋明理学当作唯一真理，主张“宁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顽固卫道士。

使东西两大文明得以越过“万丈深渊”而相遇和交流的，是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策略和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开明开放”精神。是它们构筑了跨越“深渊”的“桥”。之所以这样评价“文化适应”策略是因为：众所周知，当时充当文化交流载体的，不是科学家，不是外交官，也不是近代传媒的记者，而是天主教的传教士。而离开“文化适应”的策略，他们就不能进入中国，不能在中国立足，不能与中国先进的文人建立友谊，东西方文明



的交流也就不可能发生。

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架桥修路”工作，注定是异常艰难的。当时的耶稣会士们面临着来自上述两方面的攻击。虽然本书的作者也以一定的篇幅论及了以沈淮为首发动的“南京教案”和以杨光先为首制造的“汤若望冤狱”，但是更主要的是叙述和批判了天主教会内部的“欧洲人主义”者给奉行“适应政策”的耶稣会士们提出的种种诘难。一切争论和分歧的本质是：要使中国的天主教信徒“西方化”，还是要使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中国化”？

在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信徒必须“西方化”、“葡萄牙化”，这在教会内部似乎是不存在争论的。然而正是为此，在沙勿略死后的三十一年间，尽管众多传教士使尽浑身解数，仍然被挡在中国的高墙之外。他们徒劳地哀鸣：“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然而正如本书的作者邓恩先生所指出的：“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即使是月球也是可以到达的，重要的是一个方法问题。”首先着手探索一种全新方法的是耶稣会印度巡察使范礼安。

1574年范礼安来到了澳门。经过九个月的仔细观察和潜心研究，为天主教进入中国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他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写道：“渗入中国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而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他认为，必须放弃对中国教徒的“葡萄牙化”政策，而代之以外国传教士的“中国化”。

邓恩先生评论道，这可以称为是“划时代的观察”。它明确地预告了“欧洲人主义”的时代被打破了。

的确，范礼安对开拓“通往月球”之路，创立了划时代的功绩，但应该说，从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身上，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文化适应”的萌芽了。本书指出：“耶稣会的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不惧怕开辟新路。他制定的修会规则，对他的追随者的传教方式不做狭隘严格的限定。相反，他决定对耶稣会的成员采取与众不同的做法。修会首要的规则之一就是要求它的

成员必须学会其所在国的语言。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作为文化适应的首要法则却往往被忽视了。在当时，在外国借助翻译来讲授教义已成为通常的惯例。”更具体地说，“1542年，当教宗保禄三世派遣耶稣会士博爱特（Broet）和萨摩荣（Salmeron）到爱尔兰去的时候，依纳爵命令他们要适应爱尔兰人的风俗习惯。当另一名耶稣会士巴雷托（Barreto）被阿比西尼亚提名为族长的时候，依纳爵给他下了指示，让他表现出广泛的适应精神。于是他创建学校和医院，培养当地人做神职人员。在传播信仰的过程中，暴力和军队并不是必须的。他应该带一些工程师、农业专家和内外科医生一同到阿比西尼亚去。”“依纳爵警告巴雷托，不要贸然轻率地改变那些可能潜入礼拜仪式的陋习，而是要慢慢地改变，这样才不会不适当地触动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就是“文化适应”的滥觞。

以往的观点，总是把耶稣会的创立解释为对欧洲宗教改革的反动。这是有失公允的。意大利学者柯毅霖先生在《晚明基督论》中谈道：“巨大的政治与文化运动席卷欧洲，宗教与教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南欧和北欧对宗教革新各自做出不同的反应。马丁·路德于1517—1521年间在北欧发起宗教改革，在南欧的天主教则对其等级制度以及基层进行一场深入的自我革新。这一革新被人们很不恰当地称为消极性的反宗教改革运动。这确实是一场巨大的教会革新运动……天主教改革运动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那就是诞生了新的宗教团体……”<sup>1</sup>耶稣会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邓恩先生评论道：“宗教的修会，就像一个人一样，通常在它的年轻时期比较能够显示出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这种适应性和灵活性在它年老时则比较欠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越来越小心谨慎；偏爱走老路；不愿意承认世界不是永恒不变的和从不静止的，不愿意承认以往的规律常常是会过时和变成错误的。他们不愿去尝试新的冒险。”耶稣会当时就是一个爱尝试着走新路的“小伙子”。

与适应精神相对立的，是在大多数传教士观念中迅速膨胀

1 (意)柯毅霖著，王志成、思竹、汪建达译，《晚明基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1页。

的“欧洲人主义”和“民族主义”。邓恩先生在书中评论道：

“‘欧洲人主义’是一个精神的王国。它存在于以欧洲文化形式为终结的狭隘、高傲自大的假设当中。这些文化形式被附加了绝对的价值，因此它不可能认识其他文化的固有价值。”“文化适应，是以尊重当地文化为基础的，它植根于谦虚的精神和对无论何方的人民都有同等价值的理解之中。范礼安的这种新的也可以说是相当古老的用以解决传教难题的方法，是具有革命性的。”

作者同时批判了主导一些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优越感。他说，“民族主义对于造成‘欧洲人主义’的特殊的狭隘性是有责任的。这一民族自豪感总是将本民族的文化形式与天主教混为一谈。这样的事实在16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随处可见。在那里，西方天主教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的精神与最激烈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对葡萄牙人来说，除了穿上葡萄牙的外衣，任何包装的天主教都是不可思议的。对于西班牙人，这也是同样的事实。”

在谈到一名意大利籍的道明会士——高奇，在经过失败之后接受了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时，邓恩指出：“强调一下在中国的耶稣会、道明会和方济会的争论起因，是由于民族气质的不同，而不是由于教派的不同，决不会太过分。16世纪和17世纪初叶，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即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所在的半岛——译者注）的民族主义最为强烈。大多数在中国的传教中起着领导作用的耶稣会士，是来自那些民族主义尚未发展的国家。要是在首批来到中国的道明会和方济会的成员中意大利人占大多数，也许他们就不会与耶稣会发生冲突了。”

另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瑞尔（Ian Rae）更是一针见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都把早期耶稣会传教士称为‘葡萄牙人’，但是其奠基者和具有最杰出才能的成员却都是意大利人。”<sup>1</sup>

邓恩先生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叙述了来自菲律宾的方济会士与道明会士，以及远在日本的敌视“文化适应”策略的耶稣会士，对在中国的耶稣会“兄弟”所进行的喋喋不休的批评，以及

1 (澳) Ian Rae《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pproach of The Early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载《Review of Culture》第21期，澳门文化署1994年出版，第125页。

给他们带来的无穷灾难。作者用自第十四章之后的大量篇幅，以夹叙夹议的笔法，向读者陈述了这些争论的详情，批判了其中的谬误<sup>1</sup>。

当然，如邓恩先生所说：“认为在一开始时耶稣会传教士的成功就是建立在这些规则（指“文化适应”——译者注）之上，或者认为他们在接受这一方法时是意见一致和毫无异议的，则是一个错误。正是在中国，他们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最初始的和最为显著的努力。然而即使在这里，这些经验的取得也经历了好几十年的时间和经受了无数次令人沮丧的失败。”同时，书中还提到，天主教在印度和日本所遭遇的失败，也从反面教育了中国的耶稣会士。

关于实行“文化适应”策略的耶稣会士是不是牺牲了其宗教的原则性，这一点在教会内部是至关重要的。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为他们进行了辩护。教会以外的人们似乎对此并不过分在意，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会士们尽管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但也确实在涉及他们教义的重大问题上坚持了原则性，如他们对教徒必须恪守一夫一妻制的毫不妥协的态度，就是一个显著的证明。说他们是开创中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先驱，我看并不算是过誉。

起始于1552年沙勿略在上川岛上抱恨而死，终结于1669年康熙皇帝为汤若望平反昭雪的这部巨著，作为一部涵盖了一个多世纪的论述中国早期天主教传播史的巨著，实质上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文化适应”策略在备受非难的困境下，艰难地萌生、探索和发展的历史；或者按照作者的观点，是对公元1世纪天主教“文化适应”传统回归的历史。

关于“文化适应”策略，笔者想在这里补充一点本书以外的材料。早在汉代就有第一批犹太人来到中国。随后一直到元代，陆续都有犹太人到中国定居。他们也是笃信耶稣基督的。他们是怎样处理中西文化与宗教的差异呢？怎样对待“祭祖”和“祭孔”等中国传统礼仪的呢？利玛窦进入北京之后，就知道有一支信奉“十字教”的犹太族人在开封居住，但是没有机会亲自去考

1 作者为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都拟定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带引号的“反义”标题：“美好与喜悦”和“兄弟帮兄弟”。为了帮助中国读者更准确、更直接地理解文章的含义，我将它们分别改成“无知与偏见导演的闹剧”和“兄弟帮倒忙”。

察。在他之后，陆续有欧洲传教士亲赴开封实地考察。我在这里引述的是一位叫做骆保禄<sup>I</sup>的意大利传教士写于1704年11月5日的、记述了他考察开封犹太人所见所闻的书信。

信中写道：“由于无论过去和现在他们中均有获得过功名的读书人，我就冒昧问他们是否敬奉孔夫子。包括他们首领在内的所有人都告诉我，他们和中国不信基督教的文人一样敬孔，而且与他们一起参加在重要场合举行的正式仪式。这些犹太人还告诉我，每年春秋两季，他们像中国人习惯的那样，要到教堂旁一个厅堂里祭祖。祭品中没有猪肉，但有其他动物的肉；举行普通仪式时，他们只献上几碗菜和果酱，不过也要点香、鞠躬或磕头。我还问在他们住宅或祠堂里是否有供奉祖先的牌位。回答是他们既不用牌位，也不用画像。不过当官者另当别论，这些人去世后，人们要在祖堂设立牌位，上书其姓名和官职。”“他们把遵奉的 Dieu 称为‘天’、‘上天’、‘上帝’、‘造物者’以及‘万物主宰’。他们告诉我这些称呼取自中国书籍，用以表示上帝。”<sup>II</sup>

作为收录这封书信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一书的编者，杜赫德在骆保禄的信件之后，特别作了几点说明。其中之一这样写道：“至于中国人敬孔祭祖，那些与欧洲犹太人一样远离偶像崇拜的中国犹太人肯定认为这只是世俗和政治礼仪。如果他们从中发现具有迷信性质的宗教信仰，他们就不会与这位哲人的其他信徒一起前往孔庙，也不会为纪念祖先而焚香了。”<sup>III</sup>

这段史料说明，从明代末年起由利玛窦等人所开创的、并遭到无数非难和谴责的很多属于“文化适应”的做法，更准确地说，即双方争论不休的几个主要问题的处理方法，早在若干年，甚至成百上千年以前，在中国定居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做的。然而这些犹太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宗教。这表明，这些做法是任何希望在中国生活的耶稣基督的信徒唯一的选择。并没有证据显示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参考或吸取过这些在华犹太人的意见，但是他们殊途同归，采取的方法惊人地相似。

邓恩先生将利玛窦等“一代巨人”把“文化适应”政策具体

I 骆保禄 (Jean-Paul Gozani, 1647—1732)，意大利籍耶稣会士，1694年来华。

II 引自《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二卷，(法)杜赫德编、郑德弟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15页、第13页。

III 同上书，第20页。

地运用在中国，所形成的一整套成功的传教方法，作了如下集中的概括：

“从今以后的策略，更应注重智力传教。”“建立一个遍布全国的、高层的友好人士的网络。”“静静地渗透和在文化上逐步适应；要摒除‘欧洲人主义’；与欧洲人，特别是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接触，要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传教工作需要的资金可以从中国获得。只要在资金上还须求助澳门，就要‘小心从事，尽量少用’；当在天主教教义上不存在妥协问题时，避免同中国人的偏见和猜疑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传教的工作要‘慎重、不声张，用好的书籍和有理性的辩论向学者证实我们教义的真实性，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宗教是没有害处的，只会给帝国带来好的朝政和平安的局面’；在发展天主教徒时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

作者用大量的事实说明，无论就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而言，还是就传播天主教而言，利玛窦的方法都是唯一正确的方法。遵循了这一方法，传教士就一帆风顺，或化险为夷；违背了这一方法，就一事无成，甚至被碰得头破血流。

邓恩先生用饱蘸对自己先驱无限自豪之情的笔，讴歌了利玛窦等一代人在天主教发展史和国际文化交流史上所建树的卓越功绩：“以天主教在公元一世纪的观点来衡量，晚明时期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成就，应该被列为天主教传教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成就这一事业的这几十个人，唤醒了天主教世界使命的真谛，将世纪初期天主教的传统恢复到了正确的位置。他们反对将具有普世意义的天主教歪曲为仅仅适合于个别国家、个别地方的狭隘的宗教。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在天主教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说：“这为数不多的一伙人，以他们所创建的中国与欧洲的思想联系，几乎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自那以后的世界。如果不是后来的曲折（指后来教宗关于禁止中国礼仪和解散耶稣会等事件——译者注），把他们灿烂辉煌的贡献贬低了，耶稣会士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还会更加光彩照人。”



即使是以无神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眼光来看，邓恩先生的上述评价也是站得住脚的。

### 三

本书作者邓恩 (George H. Dunne)，是一位美国现代耶稣会士。他生于1905年，于1998年6月30日在加州的 Los Gatos 去世，享年92岁。他生前曾在圣路易斯大学执教，于1961年被任命为乔治敦大学校长助理。

邓恩神父与中国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五十多年以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是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新中国成立后，他结束了在中国传教的事业，返回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来华传教士研究为题的。但是他的论文基本上只是利用了第二手资料，对此他感到十分不满足，于是产生了到罗马去继续他的研究的动机。1959年10月，他的计划实现了。在罗马梵蒂冈档案馆汗牛充栋的档案、手稿的海洋里，他考稽钩沉、潜心爬梳，以大量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充实和扩展了他的研究。本书就是他多年辛勤耕耘的结晶。该书经印第安纳州 Notre Dame 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就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本书原名《巨人的一代：明末最后几十年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故事》(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重版本、法文译本、德文译本的书名都有改动。此次中译，改名为《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

乔治敦大学历史系教授魏若望 (J. Witek) 博士这样评价说：“在整个19世纪，只有一位研究者——钱德明 (Jean-Joseph Marie Amiot，曾在清王朝朝廷中服务过的法国耶稣会士) 利用过手稿资料。在20世纪初，即1911年至1913年间，在利玛窦的家乡马切拉塔，汾屠立 (Piero Tacchi-Venturi) 神父为纪念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而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利玛窦著作集——《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Oeere Storiche de P. Matteo Ricci)。其中第一卷是他的《中国报导》(即后来翻译成中文的《利玛